



红色

记忆

童年,是人的一生中最难忘、最美好的时光。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孩子们,在父母的陪伴下无忧无虑地快乐成长。然而,73年前,来自延安、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一群孩子,却冒着敌机的轰炸、忍受饥饿的困扰,在井陉孙庄和行唐北高里、慈县度过了他们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。

“红色摇篮”里的难忘时光

□本报记者 杨惠玲 文/图

日前,在几大卫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啊摇篮》已接近尾声。早在1979年,同名电影《啊!摇篮》的热映,也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一部红色经典。这些影视剧讲述了战争年代众多革命者为了保护“红色后代”浴血奋战的经历。当年,一群来自延安的孩子,过黄河越太行,到达晋察冀边区,合并成立了“华北育才小学”,这些孩子在井陉孙庄和行唐北高里、慈县度过了难忘的一年多时光。

至今,井陉孙庄村还保留着当年学校的旧址,而以现代化标准建起的“孙庄育才学校”和“行唐育才学校”依然传承着老一辈的革命精神。

三校合并成立“华北育才小学”

在距离省会石家庄市区约50公里处的井陉县孙庄村,有一所“孙庄育才学校”,它的前身是“华北育才小学”,这是一所在战争年代专为培养“红色后代”而成立的小学。

在孙庄育才学校的“校史室”内,一幅幅照片和文字资料,讲述着华北育才小学在这里度过的艰苦岁月。

抗战开始后,陕甘宁边区奔赴前线作战的大批干部子女留在后方无人照管,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学校,收留干部子弟和烈士遗孤。1938年1月,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在延安成立。

1938年4月,陕甘宁边区决定将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与延安完小合并成立“延安鲁迅小学”。后由于日军飞机经常侵袭,鲁小与边区中学合并成立边区中学小学部。

1939年2月,边区中学小学部单独建校,改名为“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”,简称“延安保小”。

1947年,敌人开始向陕甘宁地区进攻,学校又搬了几次家。在敌后辗转数月,对学生的生活及学习影响颇大,因而又决定搬往太行区。从陕甘宁到太行区,爬过高山、越过冰河,经过了两千多里的长途跋涉,面对敌人的包围、敌机的轰炸、寒暑的侵袭,饥饿的威胁,这群孩子们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,终于在当年的8月到达目的地,仍称“延安保小”。

1948年7月1日,华北局决定将延安保小、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、晋冀鲁豫边区的邯郸行知学校三校合并,在井陉县孙庄村成立了“华北育才小学”。

500多个孩子来到井陉孙庄

1948年7月,500多个孩子坐汽车来到了井陉县孙庄村。

“好几辆汽车把他们拉到了村里,那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汽车。”今年80岁的井陉孙庄村民高学忠老人回忆,这些孩子都比他年龄大,最小的七八岁,最大的十五六岁。“他们都穿着军装式样的衣服,说话做事都很有规矩。”后来,他们都被分别安排到孙庄村民家中,开始了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。后来村民们才知道,这些孩子都是当时干部的子女和烈士遗孤。

孙庄村至今完好保存着华北育才小学的旧址。孙庄育才学校校长贾彦军介绍,这是一处古旧院落,有正房五间,中间三间打通用作教室,让孩子们读书学习。因条件有限,学校的课堂被分散在多处。

高学忠说,当年村民们都将最好的房屋腾出来给孩子们住,把好东西拿出来给孩子们吃。“学生们吃饭就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,我家西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课堂。”高学忠说,因为学生们都是集体活动,有着严格的纪律,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他们一起玩耍。“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经常组织活动,给村民们表演节目。”高学忠说,有师生们自己编演的小节目,还有秧歌,“他们的秧歌扭得很好,村民们都喜欢看。”

“华北育才小学”在孙庄驻留三个月后,在校长

郭林的带领下迁往行唐。

800师生奉命迁址行唐

1948年,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。华北育才小学成立不久,走出山区办学就被提上华北局的议事日程,最后确定迁址行唐,办学地点选在北高里和慈县。

“迁来行唐办学的华北育才小学,是一支800多人的庞大队伍。”行唐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刘云平介绍,1948年10月21日,华北育才小学师生全部到达行唐驻地,以北高里村为总校,分校设在慈县村。

但华北育才小学到行唐后还未来得及正式开课,就接到华北局通知,国民党傅作义部欲偷袭西柏坡,学校向灵寿山区紧急疏散。

这年11月中旬,敌人偷袭石家庄、西柏坡阴谋失败,华北育才小学奉命返回行唐驻地。“11月10日,接华北局指示,情况已好转,学校仍返回原驻地,迅速复课……”

北高里和慈县隔河相望,是行唐县最大的两个村子。由于刚刚解放不久,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还很差,华北育才小学的师生大都安排到老百姓家里住,课堂、办公室则以祠堂、寺庙等建筑为主。

刘云平介绍,一开始没有课桌,孩子们就把书垫在膝盖上写字;后来,垒了土台,栽了木桩,搭起木板,才算是有了课桌。当地乡亲们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师生们住,帮助他们拾柴做饭、拆洗被褥、缝补衣服。学生们则每天早晨起来主动帮助群众打水、扫院子、铡草、喂牲口。搬来行唐的第二年,赶上闹灾荒,学校决定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,帮助困难群众度过灾荒。当年的日子虽然很清苦,但处处彰显着老区人民与华北育才小学师生间的鱼水深情。

1949年7月,华北育才小学师生分三批随党中央迁入北京,改名为“北京育才小学”。

学子始终惦念“第二故乡”

“李铁映、伍绍祖、栗前明、刘瑞生、卢伯英、潘江汉等,当年都是华北育才小学的学生。”孙庄育才学校校长贾彦军介绍。

当年,华北育才小学的孩子们与学校所在地井陉孙庄、行唐北高里和慈县的村民都建立了深厚

的感情。临分别的时候,大家都依依不舍,村民们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,孩子们也都把学校驻地当成了“第二故乡”。

几十年后,当年在华北育才小学学习的孩子们都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之材,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,也有很多人成为不同行业的专家,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“第二故乡”,多次回来“探亲”。

2007年9月,华北育才小学的老校友分别从当年的“延安保小”“光明小学”“行知学校”三所学校出发,重走当年行军路线,最后在孙庄会师,为乡亲们奉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。2008年,当年学生中的80多人一同回到了孙庄,寻找当年给予他们温暖的老房东,看望他们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在孙庄育才学校“校史室”内摆放着校友捐赠的各种航天模型。小讲解员指着室内张贴的学生花名册介绍,其中的“罗小金”就是李铁映当年的化名。

李铁映也多次回到“第二故乡”,他曾多次回行唐看望乡亲们,并帮助慈县村建立了“希望小学”。在李铁映的直接关怀下,在行唐华北育才小学旧址建起了“行唐育才学校”,他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,并在新落成的教室黑板上写下了“为中华之振兴而学习”几个大字。

因为华北育才小学的入驻,使得井陉孙庄和行唐北高里、慈县这几个默默无闻的村庄作为一个个“红色摇篮”,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

1948年7月1日,华北育才小学成立。



井陉孙庄村华北育才小学旧址。



档案活百年

石家庄红色档案故事

主办:石家庄市档案馆 石家庄日报

聂荣臻在平山

1937年11月,由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成立。不久,日军纠集两万余兵力对晋察冀发动二十五路围攻。聂荣臻率部从山西五台县一路转战到平山县,平山县蛟潭庄成为晋察冀军区的指挥中枢。反围攻胜利后,1939年4月,聂荣臻和晋察冀军区离开蛟潭庄,迁往阜平县。

百团大战后,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实施“铁壁合围大扫荡”。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区机关从阜平向平山的滹沱河两岸机动,指挥军民坚持反“扫荡”斗争。

在紧张的反“扫荡”间隙,聂荣臻登上西黄泥村附近的一座大山,望着滹沱河两岸大片的稻田,他情不自禁地对随行人员说,这里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啊。早年曾在莫斯科求学的聂荣臻,深知“粮仓”乌克兰对于苏联的重要意义。在他眼里,平山就是晋察冀的大粮仓。

在艰苦的反“扫荡”岁月里,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和自然灾害,晋察冀军区部队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短缺。1942年春,聂荣臻发出训令,要求部队不能采摘榆树叶、杨树叶,不能在村庄附近挖野菜,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与民争食。春耕时节,聂荣臻号召官兵帮助乡亲们发展生产,部队的战马也成了春耕的主力。

1942年9月,聂荣臻在平山县宅北村主持召开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,发出“到敌后之敌后”的号召,这对扭转边区的被动形势,收回被日军“蚕食”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。1943年4月,聂荣臻率领晋察冀机关再次离开平山,安全转移到阜平。

在艰苦的抗战岁月,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,两次驻扎在平山共三年多时间,晋察冀军区部队从3000人发展到32万人,成功开辟了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,为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。



聂荣臻在平山县蛟潭庄村口。

周建屏与建屏县

在平山县小觉镇的一处山坡上,一名来自江西省的老红军长眠于此。他是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。

周建屏祖籍江西省金溪县,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。他曾担任红十军军长,参加过南昌起义、红军长征和平型关战役,病逝前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。

1937年11月7日,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晋察冀军区。当时担任第115师343旅副旅长的周建屏被任命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。第四军分区位于正太铁路沿线,所辖范围以河北省平山县和山西省盂县为主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

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刚成立不久,日军通过正太铁路调集1000多兵力,向平山县扑来,企图趁第四军分区立足未稳就将其扼杀在摇篮中。周建屏带领将士在深山里周旋了一个月,最终把敌人引入了埋伏圈。当日军进入两山夹持的谷地时,周建屏指挥部队奋勇杀敌,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,歼敌大部,取得胜利。

周建屏戎马生涯三十载,在枪林弹雨中七次负伤。1938年6月13日,周建屏因旧伤复发在平山县小觉镇病逝,终年46岁。为了纪念这位抗日将领,根据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,1940年8月,晋察冀边区将平山、井陉、获鹿三县部分区域合在一起,命名为建屏县;1945年抗战胜利后,原建屏县撤销并重新设置,新建屏县的县域范围涵盖现在洪子店、蛟潭庄、小觉等九个西部区。1958年,建屏县被撤销并入平山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周建屏烈士遗骨迁葬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。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:在晋察冀土地上,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、红军时期就当过军长的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,于1938年6月牺牲在战斗岗位上,他在作战中英勇捐躯,效命沙场,永远值得我们纪念!



周建屏



芒种忙 麦上场

《六月芒种》中写道:“芒种,是多么美的名字,稻子的背负是芒种,麦穗的承担是芒种……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,也是芒种。”宋代诗人陆游在《时雨》一诗中写道: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,处处麦歌长。”

“芒种”一词最早出自《周礼》,“芒”,是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获,“种”是指谷黍类作物播种的节令,“芒种”二字谐音“忙种”,表明此时正是农人播种、下地最为繁忙的时候。乡谚“芒种忙,麦上场”的意思就是说,有芒的麦子快收,有芒的稻子可种,仲夏时节正式开始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:“五月节,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意指大麦、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,抢收十分急迫。晚谷、黍、稷等夏播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,故又称“芒种”。春争日,夏争时,“争时”即指这个时节的收种农忙,故而民间把“芒种”称为“忙种”,可谓是恰如其

分。

我国古代把芒种分为三候。一候螳螂生;螳螂于上一年深秋产卵,一壳百子,到

芒种时节,小螳螂感应到了此时阴气渐强而破壳而出。

“蝉响螳螂急,鱼深翡翠闲”。螳螂是饮风食露的草虫,捕蝉而食,故又名杀虫;因其飞捷如马,又叫天马;因其前足如叉,也叫斧马。二候鹏始鸣:鹏是指伯劳鸟,一种小型猛禽,也就是“劳燕分飞”的“劳”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,并且感阴而鸣。它的鸣声局促尖锐,声音是别春之离愁。当然,伯劳初噪月微明,亦是仲夏夜寻梦的美丽诗意图。三候反舌无声:与伯劳鸟相反,反舌是一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鸟,此时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。另外,一些雀鸟此时也不再发声鸣叫。

因芒种节气交近农历五月间,故又称“芒种”。在古代,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,饯送花神归位,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,盼望来年再次相会。南朝梁代崔灵思在《三礼义宗》中记载:“五月芒种为节者,言时可以种有芒之谷,故以芒种为名,芒种节举行祭饯花神之会。”古人讲究善始善终,农历二月二花朝节上迎花神,农历五月芒种节上送花神归位,花朝为始,芒种为终,一迎一送,有去有来,离而不伤,风雅之至。

“忆昔好饮酒,素盘进青梅”。在南方,芒种时节梅子成熟,民间广泛流传着“煮梅”的食俗。芒种煮梅,解渴消夏,实乃一件快事和雅事。芒种煮梅习俗,据说开始于夏朝,由于梅子又酸又涩,难以直接入口,于是民间创造出了多种煮梅之法,让人大饱口福。三国时,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和“望梅止渴”的典故广为人知,梅也因此被赋予了特别的文化内涵。所谓“青梅煮酒”,其实就是将青梅置于黄酒中加热,等到青梅略微变色,趁着热乎劲儿饮上一口,梅子的酸甜借着黄酒的醇香荡漾开来,令人心旷神怡,齿颊留香。宋代诗人谢逸有一首《望江南》的诗,里面对“青梅煮酒”的描述可谓生动传神:“漫摘青梅尝煮酒,旋煎白雪试新茶。”

□梁永刚

熏风拂面,万木葱茏,天气一天比一天热。时令这位好客的主人,刚把小满送出门外,芒种就急不可耐地跨入了仲夏的门槛。

芒种,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、夏季的第一个节气,也是“三夏”(夏收、夏种、夏管)期间农事色彩最为浓郁的一个重要农时节气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垄黄”。此时,小满已过,夏至未至,我国黄淮流域进入农业生产活动最繁忙的季节。农谚说“芒种三天见麦茬”,过了芒种,就要开镰收麦了。乡间关于芒种节气的农谚,就像藏在草丛里的小野瓜,掂起藤就是一串,“芒种芒种,抢收抢种”、“芒种忙两头,忙收又忙种”、“芒种芒种,全家出动”。

夏季的六个节气中,芒种最富有诗意,文学味道也最浓。散文家林清玄在